

編後語

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五周年，如何總結改革成果、深化改革方向，進而實現新的突破，亟待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海內外人士迫切思考。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以「改革開放：回顧與反思」為題，邀請了三位專家學者撰文討論，希望收拋磚引玉之效。作為中國改革的重要見證人，朱嘉明從宏觀角度提出十四點個人思考，包括改革的結束時間點、指導觀念和理論、政治內涵、代際效應，以至改革與全球化、科技革命、世界性變革的關係等議題。有關討論雖然點到即止，但卻言簡意賅、發人深省，為學界進一步深入探討提供了一份思考藍圖。姚洋在文章開首即提出一個似乎是不說自明的問題：中國是否還處於改革開放進程之中？他的答案是否定的：改革開放前二十年（1978-1997）是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反動，後二十年（1998-2017）是享受改革紅利，向「常態」的發展中國家回歸；2017年十九大以後則開啟了不同於改革時期的新時代，以矯正改革以來衍生的種種積弊為目標。何包鋼提出另一個尖銳的議題：中國政治制度能否為跨世紀的崛起提供平台和保障？文章沒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提出從「內外一體」的理論框架看中國與世界，指出政治制度改革的不徹底不利於中國擴大全球的影響力，對推動區域合作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等均造成一定的妨礙。

本期「學術論文」欄目刊出四篇文章，討論民國以迄當代中國的重要文化和政治事件。高子文考察了1920至40年代「話劇」概念的起源和演變經過，指出「話劇」話語的建構與此前「新劇」、「文明戲」等概念截然不同，反映了知識份子認定現代藝術深具啟蒙的社會功能，致力主動建構糅合個人啟蒙與民族性觀念的可能性。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，學術界普遍的共識是毛澤東精心策劃、目標一以貫之的一場政治大革命。吳一慶認為這種「目的論」(teleology)敘事有待商榷，指出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一場「文化革命」恰恰是文革最初的意圖，與1966年夏天轉向政治的發展方向存在根本差異。1967年文革進入「全面奪權」的階段，嚴飛、武瑞以廣州的奪權運動為例，指出由於中央領導人在奪權問題上取態出現分歧，導致地方派系不斷分化和重組，造反派的分化並非出於意識形態原因，而是對奪權的時機和方式有不同看法，分化的派系實則同屬激進派的兩翼，不存在「保守」和「激進」之分。1980年代，當代中國水利志編修工作蔚為風氣。張景平、陳智威以河西走廊為案例，指出修纂工作以「自上而下推動、自下而上完成」為特點，在組織、人員和編寫流程上深具行業特色。由於種種原因，部分研究成果僅存於各級水利部門的檔案室，但其史料價值豐富，治水利史學者宜善加利用。

本期是敝刊出版第200期的重要里程碑，衷心感謝編委、作者和讀者多年來的支持和關愛。在未來的日子，我們期望繼續悉心經營這片細小的文化園地，為中國文化的長期發展而努力。